

# 加快重构生活性服务业生态

项峥

生活性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支柱产业。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缓慢、运行不规范、质量不高、消费环境恶劣等问题较为突出,影响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品质的提高。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将有利于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生态重构,实现生活性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 生活性服务业生态系统建设滞后

生活性服务业是服务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吸纳社会就业人口的重要渠道,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有效通道。2014年,我国新登记注册服务业企业同比增长50%;服务业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到1.78亿人,较上年增加2503.9万人。据2010年数据统计,生活性服务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虽然生活性服务业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生态状况不佳,影响到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社会整体认知有待提升。传统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旧观念依然

根深蒂固。在生活性服务业各业态中,类似家政服务业、美容美发、废旧回收等,往往得不到社会公众认知上的肯定,从事有关行业的人员也得不到社会公众应有的尊重,影响到行业整体运行质量的有效提升。目前,在诸如此类生活性服务业,主要由外来务工人员支持行业运转,本地居民鲜有涉及,城镇下岗职工宁愿接受政府救济也不愿从事这些行业。地方政府管理理念也相对滞后,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活性服务业需要在规范中发展的重要性,对无证商贩、地摊严厉打击,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需求,反而影响到相关服务供应。目前,一些大城市就深受“早餐”问题困扰,大城市生活节奏注定部分家庭早餐需要通过市场解决。如果社会管理对流动早餐经营店实行过度管制,而不是进行有效疏导,那么就可能导致部分城镇居民早餐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

二是行业规范管理成本高昂。生活性服务业就业人员中相当部分属于外来务工人员,职业教育程度总体较低,一定程度影响到行业运营管理的规范性。同时,行业管理规范缺失、滞后或不成系统,散见于不同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不利于行业依规运营。行业管理职责分散,缺乏统筹协调,导致政府管理力度不够,难以有效制止、打击行业不规范行为,导致行业负面舆情不断,

损害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困扰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问题,服务质量保障问题,已经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三是可持续稳健发展受到制约。生活性服务业可持续稳健发展的前提是有效控制成本。但生活性服务业运营日益面临成本上升困扰。生活性服务业主要成本是房租和人工成本。近年来,随着城镇房价快速上涨,经营场所房租也呈现出上升态势。消费品价格上涨也导致人工成本呈现出上升趋势,影响到行业盈利提升。运营成本上升也迫使企业大量雇佣流动人口,职业培训投入不足,导致服务质量低下。同时,由于布局不合理,服务性行业过于集中扎堆导致同业竞争激烈,减少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空间。

## 国务院重视将给该行业注入发展动力

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从加强政府规划、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入手,在分类指导基础上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新供给,提升质量,将给生活性服务业注入发展动力,有利于重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生态。

一是有利于改变社会认知。国务院层面出台文件后,地方政府积极落实,生活性服务业地位将会明显提升,这将有助于改变社会公众对生活性服务业的落后认知。文件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投向生活性服务业”。随着各类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生活性服务业,全社会对生活性服务业的整体认知将会显著提升,城镇居民参与生活性服务业的热情也会上升。

二是促进行业规范管理。生活性服务业消费环境不佳主要是行业规范管理

不到位。为此,文件提出要形成“企业规范、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完全符合生活性服务业运营特点。在宏观经济稳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对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也将明显提升。而国家层面出台文件指导,必然在地方层面层层落实,将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行业规范管理制度环境。

三是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文件从扩大供给入手,对十个业态制定可操作化细则,扩大了相关业态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在“加大财税、金融、价格、土地政策引导支持”,推动职业化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运营成本压力,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更好地与社会需求进行匹配。

## 要真正形成行政执法与管理合力

综合来看,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潜力较大,并与新型城镇化产生共振,支持农业就业转移人口城镇就业,稳定经济增长,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下一阶段是要严格落实国务院文件,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区人口集聚特点与优势,研究发展符合本地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的生活性服务业于业态,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因地制宜,完善可操作性细则,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以文件印发、转发来代替文件执行。在涉及行业规范化管理上,要真正形成行政执法与管理合力。在政策支持上,要切实制定符合各子业态的政策措施,将优惠政策真正落地,将实惠真正带给人民群众。

# 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供求平衡

谭浩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一新的提法,也为“十三五”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近段时间以来,各方围绕“供给侧改革”正在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多数观点认为,管理工作已从需求端转向了供给端,从总需求管理转向了总供给管理。今后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如何解决好供给侧的问题了。

从表面看,确实如此。既然提出“供给侧改革”,那不正是说明供给侧存在问题吗?工作的重点,自然也要转向供给端了。关键在于,当下的需求端,也不是完美无暇,也不是可以置之不管。对供给侧进行改革,决不是就供给论供给,把需求置之不理,而是要通过改革,改善供求关系,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对中国来说,只有供求关系平衡了,经济发展才能真正步入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实行的是需求引导供给、供给改善需求的发展策略。原因就在于,物资的长期短缺,为以需求为核心的供求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钢铁、水泥等与建设关系密切的行业,一直被认为是必须以举国之力发展的行业。因此,改革开放后建设的第一个影响最大的企业,也是钢铁企业。但是,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物资短缺矛盾的不断缓解,市场供求关系也在发生着积极变化,多数领域已经不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慢慢地,供求关系也达到了平衡状态。有的行业,则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现象,形成新的供求关系不平衡。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样的不平衡现象就更加严重、更加突出了。

为什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那么来势汹汹,中国却能够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从容应对,甚至挽救了整个亚洲经济

就在于那时的市场供求关系是平衡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内,对我国生产的产品是需求比较旺的。即便供给侧存在矛盾和问题,也被需求端的旺盛所掩盖了,未能爆发。但是,供给侧存在的高产能、低效率、低质量、低效益问题,对需求端提出了太高的要求,更何况,需求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也进入了增长的瓶颈期,根本满足不了供给侧生产能力的供应。这样,供求矛盾就越来越突出了。

所以,提出对供给侧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现状的。而“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自然也应该是在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缺乏质量和品牌优势、没有核心竞争力等方面,而不仅仅是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对政府来说,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如何制定好改革的规则,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企业这个市场主体的作用,让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和竞争要求作出选择、作出改变。如何仍然采用行政干预和组织的方式,就必然会形成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企业之间的冲突,使改革的阻力增大。特别是地方政府,会为了自身利益,强行阻挠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阻挠“供给侧改革”。因为,“供给侧改革”很大程度上需要对块块利益进行调整,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只有让市场对“供给侧改革”更多的发挥作用,让企业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主体,“供给侧改革”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

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改善供求关系。供求关系能否平衡,仅有“供给侧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应当统筹兼顾,协调运行,抓好需求端的改革,重点在疏通流通环节、消除各种障碍、提高服务水平上下功夫,从而使供给和需求能够基本平衡。

# 供给侧需求侧须双管齐下

许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表述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也释放出“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信号。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既要有眼前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宏观政策在需求侧还是在供给侧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侧重。

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是“供给侧”,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三驾马车”是从经济运行的结果出发的,便于宏观调控进行短期的逆周期调节,是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侧动力,而不是发展的原动力。而强调供给侧是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角度观察、认识问题,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才是经

济发展的根本性、可持续的动力,它们都处在供给侧,更加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结构问题。要走出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惯性,避免发生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产能过剩等问题,就必须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从产业、企业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在生产供给端着手创造新供给,来满足新需求。只有这样,才能针对新常态下的经济矛盾,既抓住当前重点问题,又注重长期均衡发展。

结合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供给侧管理其一直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的,只是过于强调和重视需求侧,比如淘汰落后产能、减轻企业税负等这些一直都在做,只是在这方面工作的紧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未来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也还要做,投资方面还有社会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等的投资不足,消费方面还有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扩大,出口方面还有服务贸易出口仍有很大潜力,扩大内需也大有潜力。

如果将能够短期显效的需求侧改革比作“西药”,更重长远的供给侧改革则好比“中药”。“十三五”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第一个五年,中国需要“中西医”结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纾解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顽疾。使得中国经济在优化结构中实现转型升级、良性循环,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 保障农民工工资应有常态机制

桑胜高

人社部日前召开2016年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视频会,要求大力清理欠薪,努力做好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应得工资。

人社部提前部署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相关工作,有利于缓解春节期间针对农民工的恶意欠薪行为带来的社会压力,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及时拿到工资提供一份保障。但是,惩治恶意欠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这项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有常态化机制。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欠薪案件早发、多发,案件数量和欠薪金额大幅上升。欠薪问题从工程建设领域向加工制造业、采掘业等其他领域扩展的势头明显。同时,因欠薪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明显增多,处置难度越来越大。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突发事件达到11007起,比去年同期增长34%。这说明,惩治恶意欠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已不再单纯是一项“时令性”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的治理工程。

农民工遭到恶意欠薪的原因很多。除了用工企业、包工头道德缺失,失信于农民工外,还与广大名民工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强、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存在一定空隙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外出打工基本上没有与用工企业或包工头签订法律协议的习惯,仅凭单纯的信任来维系劳动关系,这给一些

不良用工企业或包工头可乘之机,农民工一旦遭到恶意欠薪,打起官司来缺少有力证据。再者,目前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仅限于对有举报投诉进行监督问责,还没有做到常态化监督监管;在应对一些农民工讨薪维权案件上相互掣肘、相互推诿扯皮;等等。

惩治恶意欠薪,保障农民工工资到位需树立协同思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治。一方面,应整合相关力量对恶意欠薪行为进行严惩。各地人社部门应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联合惩戒力度,同时,协调司法、工会等部门落实法律援助制度,为有需求的农民工维权及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尤其是,应对严重违法失信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形成有力震慑。

同时,应建立农民工工资日清月结的保障机制。一是应加强农民工工资的独立核算和审批管理,要求用工方在编制项目预算时,应将农民工工资单独进行核算,做到足额、到位;而相关审批部门在工程审批时,应将农民工工资的预算情况进行重点审核。二是各地应建立农民工工资专门发放平台,采取“用人单位出资,劳动部门负责过程监督,银行账户统一发放”的形式,让农民工工资的时间固定化、程序规范化。三是各地应建立农民工工资发放监督监管平台,确保农民工工资发放到位。另外,还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维权意识,引导他们积极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 货币增速回升态势难持续

胡月晓

下半年以来,中国货币环境呈现全面好转迹象:货币活性增加,M1反弹超越M2回升;M2增速持续位于13%上方,增长水准不仅高于上半年,而且高于年度增长政策目标12%。综合各方因素看,笔者认为,货币结构优化难成“金叉”,当前13%上方的货币增速要维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未来或面临货币增速再回落的局面。

下半年中国货币增长的一个明显变动特征是,M2增长保持平稳的同时,M1增长快速提升,货币结构发生变化的资金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储蓄搬家和同业业务类型的趋势性改变——利率市场化使得存款搬家,储蓄变理财;表外业务规范使得同业存款变成非金融企业存款,从而在M2保

持不变的同时,M1发生大幅提升。

下半年货币增长最大的变化,不在于M2增长的屡屡超预期回升,而在于M2保持平稳的同时M1再度延续了大幅度回升态势。不过,我们仍然肯定地认为,M1超越M2的增长,仅是一种伪“货币金叉”现象。关于“货币金叉”我们过去有过多次说明:当经济周期走出底部,处于上升阶段时,企业经营活力上升,货币活性增加,故而M1会快于M2上升,在统计图表上就会表现为M1上穿M2的“货币金叉”现象。显然,当前经济运行仍然是下行压力较大,走出底部徘徊阶段的迹象还未出现。M1超越M2增长,应当仅是短期现象,是利率市场化初期,社会资金结构调整的结果。

中国的货币形成机制虽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货币投放主动性增强,但是,外汇占款的变动,仍然是决定着货币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货币存量

过多情况下,货币当局对资本外流有着充足的“淡定”资本——中国不需要对当前经济下行采用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政策重点只需调整结构、引导资金流向实体即可;过去为“冲销”巨额外汇而建立起了高存准率,用这个巨大的资金池“对冲”资金外流,有着较为充足的空间。

资本外流+公开市场等其它主动投放力度的不足,导致了目前中国基础货币增长的缓慢,甚至下降状态。2015年9月,中国基础货币同比增速甚至下降了-1.97%。

当前货币增速的维持,主要是靠货币乘数增加的结果。货币乘数的变动与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等部门的活动有关,但整体而言,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央行,即央行通过存准率的调整,对货币乘数倍数有着直接的约束。

受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变动的影

响,未来资本外流压力仍将维持高位,外汇占款仍将给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带来负面冲击。在中性货币政策基调下,中国未来基础货币增长仍将保持低速状态。笔者认为,稳健货币政策是一种无奈选择,就中国目前的央行控制能力而言,国际资本持续外流,央行除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RRR)对冲外,其它冲销手段有限——准备金市场规模有限,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为主的经营结构并未改变。

就货币乘数的主要决定因素RRR的基准来看,当前货币乘数对应的历史RRR为2006年时水准,当时的RRR为8%-9%。考虑当前的经济低迷背景,比较当前(RRR大型机构为17%,符合条件的小型机构为15%)和2006年的RRR,两者间的巨大差距表明,当前货币乘数或是虚高的,未来货币增速要维持目前水准也不是一件轻松任务。



## 国务院发文推进六大领域消费升级



增长倚重新消费,决策出现新思维。六大领域受重视,服务行业排首位。绿色经济谋扩展,农村市场有作为。财政补贴审慎用,无形之手将发威。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